

时代·阶级·民族

——《心灵史》思想文化刍议

尤作勇 李 华

内容提要： 文章从时代、阶级、民族三个层面介入对《心灵史》的解读。体认与批判兼具的独特时代观念是《心灵史》的叙述基点，融入了自由理念的阶级是《心灵史》的叙述主体，而中华民族与回族的双重民族视野则构建了《心灵史》的内在品格。

关键词： 《心灵史》 时代 阶级 民族

张承志的小说创作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步。由其中篇名作《黑骏马》《北方的河》所刻画的道德理想主义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张承志小说创作的重要标识。80 年代的张承志小说创作无论在具体的风格上多么独树一帜，其与 80 年代的时代潮流契合的印记仍被认为无从抹除。这样的小说创作最终仍可被归为 80 年代独特的精神氛围的产物。在进入到 90 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坛集体实现了陈思和所谓的由共名到无名的转变，这时的作家创作更加凸显了一种个人性的话语方式。21 世纪初由上海文学评论界评选出的 90 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最高成就。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作品前十名的榜单中，张承志与他的《心灵史》双双入选。《心灵史》被归属于张承志 90 年代的小说创作，自然是因为它的出版时间是在 1991 年。而实际情况却是，《心灵史》早在 1989 年就已经完成了。因此可以说，《心灵史》并非完整意义上的 90 年代文学创作。在写作《心灵史》之时，张承志就已经决意要告别文坛。而在此后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张承志也果然没有再写一篇小说作品。由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与众多文学青年集体出动，到 80 年代末《心灵史》的倏尔一击，再到 90 年代的决然退出文坛，张承志无疑刻画了一幅中国当代文坛最为独特的文学行进图。而《心灵史》正处在这幅图的中枢位置，这也是张承志文学创作最具总结意义的一部作品，几乎隐藏了张承志文学创作的所有秘密。他在这部作品中呈现出的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上的几大主题词——时代、阶级、民族

之间的深度纠缠,再一次表明了其“鲁迅意义”上作家的身分定位。

时 代

张承志无疑是一个对时代认知极为独特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也许再没有哪个作家能像张承志这样如此醉心于不断往身上涂抹自己曾经所属的那个时代的印记。当代中国的作家们正不断追逐着一个又一个瞬间涌起又顷刻消散的随时更新的时代潮流,纷纷争作文学界的时尚达人。而张承志在这种意义上是最不合时宜的一个作家。

张承志在“时代”面前所展示的独特姿态是我们能够有效进入张承志心灵世界的第一个重要关口。“时代”作为现代性思想极为核心的概念,它指示出,人类的生存甚至思想文化是可以依赖我们的科学智慧不断去更新创造的世界。西方近现代思潮川流不断,风云变幻的历史无疑最为有力地展示了“时代”思想之于人类生存及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当“新”成为一种更高的价值认定,“旧”的一切都可以被合法地全部予以抛弃。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正是以如此义无反顾的姿态不断奔向永远更新的世界。“五四”以后,中国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到了这一行列。而且,还是以一种不断跃进的姿势走在了这样的历史征途中,并希望藉此赶英超美。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民对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仇视心态一刻都没有消除,却仍毫无任何心理障碍地视英美为追赶的最大目标,中国近现代国民生存与国民心理的全部吊诡与凄厉在其中可谓显露无遗。毛泽东时代的我们还是一个活得无比抽象的民族,改革开放时代的我们已经轻巧迅捷地变得无比实际。对此也许我们不但觉得自然而然,并且还可以无比骄傲地宣称——我们是无愧于时代的。

那么“时代”是否真的就是人类淘洗自己昔日丑陋、随时可以让我们焕发新颜的洗涤剂?当旧的被宣判为非法,新的又是凭借什么获取了它的合法性?人类历史行走在自在的轨道上,如果作为人类精神良知的作家们也同样在用一种自在的眼光观照它,并亦步亦趋地追随它,这样的历史会不会有一天被发现倾覆在了深渊之中?张承志要作的就是一个拒绝在时代上空滑行的作家。对于每一个时代,他都试图掘入到其最深的肌理处,透析其与原初人性及原初精神的违拗与遇合关系——对60年代如此,步入80年代新时期亦有相似之处。人类历史说到底,就是每一个时代的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去参与原初人性与原初精神的建构史,而评判一个时代最终的、唯一的标准也只有这种原初的人性与原初的精神。张承志对此无疑拥有最大程度上的自觉:“文学、艺术、学问、认识——当我独自把这些概念推溯到它们的初衷,当我苦苦询问着它们的原初含义时,我为自己激动。”^①因此,不管是“文革”还是改革在张承志

^① 张承志:《心灵史》,载《回民的黄土高原——张承志回族题材小说选》,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3页。

那里都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面目。首先,张承志从来都不只是“文革”狂热的鼓吹者,但他也同时拒绝作像国人那样对“文革”做出无情宣判的大法官。张承志对“文革”做出的具体评价自然有待商榷,但其意义所在恰恰并不在于这样的评价是否全面和准确,而在于张承志以极为自觉的意识与态度试图去揭示“文革”作为一个特定的时代与原初人性和原初精神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违拗与遇合关系。而张承志对待 80 年代的态度仍然具有这样的意义。在 80 年代文坛与学界已经占据了重要一席之地的张承志,却在最后毅然选择了离开:“我悄无声息地脱离了学者的行列,脱离了排列着翁独健老师和史学大家名字的阵营。我更大踏步地远离着作家的行列。远离着巴金、王蒙和青年作家朋友的队伍。”^①作为 60 年代与 80 年代两个时代重要参与者并因此深具“六零”情结的张承志同时作了这两个时代最自觉的批判者。然而历史还在延续,一个又一个新的时代将会接踵而至。这一个又一个新的时代也必将展示它们与原初人性及原初精神或长或短的距离。这对于有着过于执拗的原初情结的张承志来说无疑过于煎熬。于是,他选择了逃离,逃向了一段由纯粹心灵构筑的历史。

阶 级

“阶级”无疑是当今在全世界范围内被严重污名化的一个概念,也是“文革”被清算的重要罪证之一。像对待“时代”概念一样,还原“阶级”的原始含义也是张承志的与众不同和极为深刻之处。虽然一心要逃离中国的现实生活处境,但对曾深刻介入中国现实的某些概念如“时代”“阶级”的自觉思考与传达都表明了张承志作为更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身分。《心灵史》是一部叙述作家母族——回族的一个教派——哲合忍耶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与清朝政府之间不断抗争以及为了精神信仰主动追求牺牲的小说作品。回族、教派、清朝、信仰、牺牲,由这些词汇构成的历史本身无疑已经蕴含了极为丰富、复杂的意义内涵与叙述空间。而在张承志将“阶级”注入其中以后,这段历史呈现出了更为斑驳的意义色彩与阐释张力,获取了超越一己民族的维度与品质。

以倡导阶级反抗为己任的《共产党宣言》在扉页上的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深刻影响了人类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也使得“阶级”逐步地成为了“底层”正义论的标签。“底层”自身如何自动获取了正义,无疑是所有“阶级”论者都需要正视的问题,同时需要解答 20 世纪风起云涌的民众暴力问题。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有效地回避了这类问题,而将“阶级”置放于前现代的中国历史情境中,并让其与“宗教”和“自由”进行了一次奇妙的联姻。

张承志在《心灵史》里写的是一个虽归属中国却显得极为异类的群体——哲合忍耶。他

^① 张承志:《心灵史》,载《回民的黄土高原——张承志回族题材小说选》,第 388 页。

们在生存环境与物质条件方面濒临绝境,可谓最彻底的“底层”群体:“这里是真正的穷乡僻壤,风景凄厉,民性硬悍。”^①“回民像汉人一样,无望地在这片穷山恶土中迎送生涯。”^②但张承志并没有让这样一种在物质生存上的困乏自动成为阶级反抗的理由:“一般来说,他们没有必要去羡慕那些可能比他们活得更卑贱的邻人。半饥饿的状态使伊斯兰教禁食规定显得更圣洁。他人的几近摧残人道的性压抑和肮脏的卫生状况,使实行割礼的男性和遮羞蔽体的女性获得某种神秘的满足。”^③我以为,这是张承志自觉去祛除“阶级反抗”原罪的第一步,并借此恢复“阶级”论价值观念的人性初衷。反抗、批判、解构,这些否定性的理念是人类历史与思想文化不断向前迈进的原动力,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正如任何其他的人类理念一样,其施加于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也必然是双重悖反的。所有与人类有关的一切都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遗忘了我们思想行为的人性初衷与原始欲求时,这把双刃剑刺向的正是人性与人类良善本身。张承志一再申诉“文革”是如何地违背了“支持底层阶级的动机”与“共产主义初衷”,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违背其实是必然的,因为首先是“文革”所依恃的“支持底层阶级的动机”之价值根基违背了人类的人性初衷与原始欲求。当物质占有的差异成为阶级反抗的依据,当“平等”被理解为消除一切差异,像“文革”一类的事件必然会朝向毁灭平等、民主的道路上演进,也必然只能是西美尔意义上的“没有结果的亢奋”^④。

张承志在《心灵史》的第一门里定义哲合忍耶为“穷人宗教”。“穷人”在这里自然是一种物质层面的指称,“宗教”却是一贯只能以精神自足作为唯一追求的。在这样一个奇妙的短语里,我们看到了张承志对于“阶级”的悄然修正。哲合忍耶这个“穷人宗教”一再被张承志视为最道地的“底层”阶级,其目的正是欲借此重新为“阶级”正名。张承志一直把伊斯兰—穆斯林视为全世界范围内对抗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力量。在这样的思路中,张承志为伊斯兰—哲合忍耶和社会主义设置了同一个敌人——资本主义,目的自然是极力拉拢哲合忍耶进入“阶级”阵营,但毋庸置疑,“哲合忍耶”绝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一个“阶级”。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论域里,“阶级”从来都没有获得过宗教的意义。宗教一向被马克思主义斥为“人类精神的鸦片”,“阶级”则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价值观念的产物。“穷人宗教”这个饱含了强烈的“阶级”诉求也因此显得有些奇妙的词语组合,强有力地呈现了张承志这样一位从充满浓郁“阶级”论氛围的历史语境——“文革”中走出,并因此深具“阶级”情结却同时深切体验过“文革”时代由“阶级”引发的人间恐怖的作家无比挣扎纠缠的心灵世界。在张承志看来,“文革”

① 张承志:《心灵史》,载《回民的黄土高原——张承志回族题材小说选》,第250页。

② 同上,第251页。

③ 同上,第251页。

④ 转引自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2页。

的悲剧不能重演,但“阶级”的价值仍然重要。历经两百年苦难、持续不断地向着“公家”做不屈抗争的哲合忍耶能给人类提供答案吗?

首先是一种“阶级”的发生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所有官方叙述中,底层民众的物质生存陷入绝境状态被天经地义地视为阶级反抗的最大亦是唯一的理由。如果哲合忍耶据此反抗,就不过是为中国历史上反复发作却终无意义的中国农民起义再添新章。而张承志笔下的哲合忍耶对于清朝政府的反抗行为其实只是在形式上归属了“农民起义”的范畴——农民群体反抗暴政。但在小说中,哲合忍耶的另外一个身分——宗教教派却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叙述功用。虽然身处物质生存的绝境,哲合忍耶却从未对此有过任何埋怨、愤恨、追讨——虽然毋庸置疑,这种绝境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清朝腐败政治的结果,比如甘肃冒赈案——因为哲合忍耶已经寻找到精神出路,获取了一种精神富足:“村庄里,每天都有别人家的泥屋里传出悠扬的《曼丹夜合》之声。干过尔麦里的人,脸上浮着满足喜悦的红润,上山受苦时精神十足。”^①哲合忍耶在这样的叙述中已然从根本上舍弃了世俗——物质——日常生活的一切诉求,小说家也以此抹除了“阶级”原罪的一切痕迹,这也为哲合忍耶式的“阶级”反抗行为赢得充分的正义性奠定了坚实基础。小说家借此告诉我们,哲合忍耶在导师马明心的引导下建构了一个精神自足的世界,如果这样一个世界也不能被容忍,无疑便是挑战了原初人性的底线,由此引发的一切反抗行为自然都是合乎正义的。由于与另一个伊斯兰教派花寺派发生教争,官方政府随即介入,开始大肆迫害哲合忍耶教众,暴力取缔哲合忍耶的一切宗教行为,并欲从根本上消灭哲合忍耶。自由主义一直把“思想言论、情趣意愿、集会结社”^②视为人类自由的基本领域,所有侵犯这些领域的行为无疑都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性的基本法则。清朝政府迫害哲合忍耶的行为正是侵犯了人类的这些基本自由,这也成为了哲合忍耶反抗的起点。

本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阶级”却仍需征求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自由主义的价值支持才更加具有价值圆满性,张承志对于“阶级”的原初人性还原无疑堪称彻底。我们在张承志所谓的“阶级”里,不惟看到了“阶级”,也同时看到了“宗教”,看到了“自由”,也正是“阶级、宗教、自由”的三方联姻才最终生成了张承志意义上的“阶级”品格。张承志这位秉持“阶级”信念同全球资本化做着最勇敢斗争的战士,大概绝然想不到——他的“阶级”与资本主义会拥有同样的一个思想基座——自由。

其次是“阶级”的创伤性体验。《心灵史》共分七门,一门写哲合忍耶的一代导师。依靠这

^① 张承志:《心灵史》,载《回民的黄土高原——张承志回族题材小说选》,第 258 页。

^② 参见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 14-15 页。

样一个导师系谱,《心灵史》书写了哲合忍耶二百年的悲壮传奇。在这七代导师中,第六代导师马进城也许是最为独特的一位。首先是在生前并非哲合忍耶的导师,只是死后被追认。然而他被迫认为导师却并非依仗他生前曾经对哲合忍耶做出了多少功德或贡献。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哲合忍耶的任何教务。马进城以七岁的幼童之龄走上流放生涯,十一岁便惨遭阉割,随即进入开封的一个小官吏家为仆,最后以二十五岁的青年之身死在开封。拥有如此生平的一个人的放置于哲合忍耶二百年浓墨重彩的历史流变中似乎显得太过于平庸,太缺乏可写性。那么,马进城成为一代导师以及他在哲合忍耶历史中的被铭记,到底蕴含了怎样一种人性质地,这些对于张承志的“阶级”建构又有怎样的特殊功用?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反抗具有天然的共生关系,“阶级”的被提出似乎正是为了反抗之用。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会承认一个事实,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欺压、剥削、不公都是真正存在的。如果不是如此,西方从苏格拉底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政治学探讨就是一件显得无聊的事情。而身处社会最底层的“阶级”无疑会最大程度地遭受欺压、剥削与不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似乎也因此天然地拥有了合法性。但在这样的反抗之余,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仅仅凭借遭受欺压、剥削、不公与一些人制造了欺压、剥削、不公进行反抗,那么反抗所拥有的正义性究竟能维系多久?因为欺压、剥削、不公而获取的反抗的正义性在反抗发动后会不会急剧地转化为非正义?在一种正义在握的高蹈反抗中又隐含了怎样的人性邪恶?马进城出现的意义无疑正在于此。在二百年的哲合忍耶反抗史中涌现了太多的高大英雄,出现了太多的悲壮事迹,这也构成了哲合忍耶历史的主要旋律与色调。但如此坚决、英勇的反抗行为也同时隐含了滑向本属被反抗者的邪恶的危险性。越是旗鼓相当的对手,越是本质上的同一类人。不管是出于何种理由,人性的持存一定不是依靠持续性地伤害自己的人类同胞而获取的。正是马进城,这样一个甘作奴仆、拒绝自由、领承苦难、拒绝抗争的“无罪的罪人”以自己的生命践履了哲合忍耶的创始人、第一代导师马明心的教诲,即“知识的终点,是主的认知;伊斯兰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①让“阶级”永久性地处在了受难者的地位。这样的“不抵抗”有效消融了“阶级”身上的戾气,也因此使得“阶级”永葆人性的原始初衷。我们从马进城身上所获取的最终启示只能是,深渊、苦难与困境体验仍然是人性保持温度与深度的唯一途径。

民 族

“民族”无疑是铸造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元素。正是清朝末年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构成

^① 张承志:《心灵史》,载《回民的黄土高原——张承志回族题材小说选》,第261页。

了中国能够进入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原初动力，民族拯救成为中国近现代志士仁人寻求各式改革之道最为原初的目的与任务。“感时忧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也正是这样一种民族心结最为形象化的意义呈现。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参与与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由汉族人来承担的。新与旧、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与纠缠关系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在脉络，而所谓的“旧”“中国”“传统”在很大意义上也只是指称了汉族与汉族文化。对于普通人，边缘也许是一种无法让人忍受的处境，却是所有精神工作者必须拥有的一种生命体验与精神视野。中华民族里的少数民族作家正是依靠他们的边缘处境与边缘体验达致了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在缺陷与危机的深刻洞视与有效克服。老舍如此，张承志亦如此。

《心灵史》独特的“时代”观念与“阶级”认知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读解为小说家少数民族身分所带来的独特生存感受与体验的一个结果。在这种意义上，《心灵史》最为内在的品格就是它的“民族”品格。《心灵史》所叙述的那段历史在汉族人的叙述中被命名为“回乱”或者是“回汉冲突”，不管是“回乱”说，还是“回汉冲突”说都渗透了极为狭隘的汉族正统论。面对世界，以天下正统自居，面对少数民族，以中华民族正统自居，无疑正是汉民族及其所属文化的内在病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不断走向堕落的根本性原因之一。任何的叙述，自然都有叙述者的主观价值意念投入，但如果叙述者的主观价值意念只是去肆意包裹叙述对象，而非展开与叙述对象的对话关系，这样的叙述都只能是虚假性的。张承志在《心灵史》中以回族人的身分体验开启哲合忍耶教史的叙述，却走出了一己民族的狭隘视野，成功地回复了那样一段历史的原初人性质地，并在一种原初人性的视域中通达了对于整个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观照，也有效地回应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类主要由汉族人展开的话语叙述。

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始终将回族视为中华民族的有机分子，这既超越了一种民族狭隘性，又保证了所有指向中华民族的批判都天然地具有了一种内在性。所有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无疑都首先是一种自我批判。中华民族要想获得一种真正的进步也必然依赖于这样一种自我批判的意识与立场，中国近现代的先贤们在此前所做的所有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正是建立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之上。只是，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变革三部曲过于囿于救亡图存的功利化目的，这必然使得其对于中华民族病根的诊断限于表面。鲁迅对于中国国民生存的揭示与批判足以称得上深刻，但遗憾的是，先生未能从思想文化的意义上找寻到中华民族的根本病症与解决方案。中国近现代过于功利化的救国行为本身其实已经内在含有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本缺陷。以儒家思想作为基本价值支撑的中国思想文化从来都未能建构起一种文化所必需的精神维度与精神自足性，

这就使得其所孕育出的中国的国民生存指向从来都只能是功利性的。在《心灵史》中,张承志对中国文化及其孕育的国民生存的批判处处可见:“中国文化,这是一个使中国人感受复杂的题目。它光辉灿烂,无可替代,但是它压抑人性。它深奥博大指示正道,但是它阻止着和腐蚀着宗教信仰。”^①而《心灵史》的叙述对象哲合忍耶作为一个宗教派别不管是处在日常生活的状态还是走上反抗之路都最为鲜明地展示了唯精神是从的生存品质。哲合忍耶身处物质绝境的从容坦荡来自投靠真主的精神自适,在被迫走上反抗之路后,从苏四十三到金万照一代又一代的哲合忍耶以牺牲作为最终目的的行为则将这样一种精神自适性推向极致。

《心灵史》以哲合忍耶之于中国国民生存的异端性映照了中国国民生存的根本缺陷,有力地呼应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一种自我批判帮助中华民族走出历史困境的思想理路。但这并没有成为张承志批判道路的终点。张承志虽然也批判孔孟之道,却并没有像“五四”人士那样走向一种现代化的诉求。也许对于有些精神洁癖的张承志来说,除了精神追求与精神建构,其他的一切都不值得探究。毕竟,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建设过程,并且,毋庸置疑,物质层面是其建设的主导。张承志回避现代化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些都为其进一步的并且转了向的批判提供了可能性。他接着批判的正是与现代化同步出现于人类历史的场景中并且两者有着近乎相同的内涵与外延的资本主义。在张承志看来,由孔孟之道孕育的中国人心中虽然显得有些冷漠,资本主义则是只能制造罪恶。哲合忍耶—伊斯兰的最大意义与价值并不是展现在与孔孟之道及以孔孟之道作为统治武器的封建政权的对抗上,而是“穆斯林已经是抗击世界资本进犯最坚决的革命力量,伊斯兰已经是第三世界人民挣脱资本奴役、争取人性解放的一种重要意识形态——这一点早无疑问。”^②当然,对此并非所有人都“早无疑问”。我们在张承志从批孔到批资的批判言路里,太明显地读到了文革时期话语的特质与毛泽东思想的思路。我们在这里的一个最大疑问就是,张承志凭借了什么就如此轻易地弥合了哲合忍耶—伊斯兰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巨大的缝隙?张承志欲借哲合忍耶回复“阶级”的原始初衷难能可贵,但张承志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恢复了原始初衷的“阶级”还能否进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体系之中?毕竟,“阶级”只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有机单元,正是依赖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思想体系中的其他单元的存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意义上的“阶级”才得以生成。无疑,原始“阶级”并不能让哲合忍耶—伊斯兰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亲密无间、自动合作。张承志持续高昂的姿态以及对于哲合忍耶—伊斯兰话语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话语的互相挪用不过展示了这位兼

① 张承志:《心灵史》,载《回民的黄土高原——张承志回族题材小说选》,第364页。

② 同上,第253页。

具“回族”与“红卫兵”双重身分的小说家复杂纠缠、左右失据的内心空间。

论文试图通过“时代”“阶级”和“民族”三个概念从现代思想史的角度介入对于张承志长篇小说《心灵史》的解读。因为笔者始终认为,《心灵史》的意义更多地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成就,更在于它对中国近现代史重要的思想主题所给予的有力地回应与解答。充分展示张承志小说创作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复杂对照关系无疑并不是这一篇论文所能够承担的。这篇论文最终不过是充当了一篇导言的角色,以便引领我们可以继续对张承志的小说创作做出更为切实有效的解读与论述。

(尤作勇,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李华,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

【责任编辑:周 翔】

本刊正式启用网上投稿审稿系统

本刊自 2015 年 5 月正式启用网上投稿审稿系统,网址为 <http://www.mzwxjy.org>,凡作者投稿请登录网站,按照操作提示投稿,并请仔细阅读我刊的投稿声明及投稿须知。作者注册投稿后,可在“作者查稿”中查询稿件处理情况。

《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

2015 年 5 月